

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相关史事考述*

——从赵万里佚札与王献唐佚跋说起

石 祥

内容摘要: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贴有赵万里致王献唐信,另有王献唐题跋,均未经披露。这两件史料揭示了二人因校勘《水云集》而发生的学术交往。赵万里在王献唐寄去的这部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上,过录了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。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包含多个校勘辑佚来源:王国维校出的王乃昭本相对于鲍刻本的异文、过录的王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、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佚文,以及赵万里据《诗渊》《永乐大典》校出的异文。王乃昭本曾经黄丕烈收藏,黄氏对此本的认识也有先后变化。因未见王乃昭本,加之诸家对该本称谓不一,王献唐一度将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误解为黄氏以王本为参校本临校的另一个本子,将自己校勘《汪水云集》的底本——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王孝咏本——误认为王乃昭本。王孝咏本入藏山东省立图书馆后,因抗战流转,现藏山东省博物馆。

关键词:赵万里 王献唐 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

赵万里、王献唐是近现代成就斐然的文献学者,事迹功业为人熟知,毋庸赘言。王献唐于1930年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任职期间,着手校理宋人汪元量《水云集》,网罗诸本,用力甚勤。其校本最初计划作为“海源阁秘笈四种”之一印行,因故未克实现。1984年,齐鲁书社以“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”之名影印王氏手校本,并将王氏所著《汪水云集校勘记》《汪水云集版本考》《汪水云事辑》等排印附后。据齐鲁书社本“出版说明”,柳诒徵、王重民、顾实曾协助校勘此书,该本将三人与此事有关的一些文稿、题跋、书信,以排印或影印原件的形式收入,使读者可以清晰了解他们与王献唐校本的关系。

*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“清代民国版本学学术史研究——以‘范式’形成为中心”(16YJA870006)资助。

笔者在山东省图书馆参加古籍普查工作时,在该馆未编古籍中得见一部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(此书单刻,开本宽大,未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),其卷端扉页有王献唐题跋(见图1),卷末粘贴赵万里书札(用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八行信笺纸,见图2)。这两件史料揭示王赵二人校勘《水云集》的学术交往,可由此考察王献唐校理汪集的一些细节问题;且王跋未被收入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》等已刊行的王献唐著作,赵札亦未见披露,可备日后增辑二人文集之用,具有相当价值。兹将二者照录于下:

黄莞翁手校《水云集》有数本,均见《菟圃藏书题识》。其校王乃昭本,归海盐张菊生。王氏原钞,则余为山东图书馆收得,曾据以撰校勘记者也。友人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,复与王静庵先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校辑数首,为余迻录此本上。于今午寄来,高谊可感也。赵函并贴卷后。

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百汉印斋西窗记。王献唐(下钐“献唐”朱文小方印)

此本为叶焕彬旧藏,得于北平广肆,糜银二十六饼。书虽近刻,颇黻觐,今日已为重价矣,未知他年□何,记之以质后人。(旁钐“百汉印斋”朱文小方印)

(以上均在卷前扉叶)

献唐仁兄先生有道:

接手书,敬悉一一。鲍刻《湖山类稿》,直隶书局已送来,倩人将校语录出寄奉,即请督收。所费有限,请不必较量,至祷至祷。所校黄丕烈校王乃昭本,现归沪上友人张氏。至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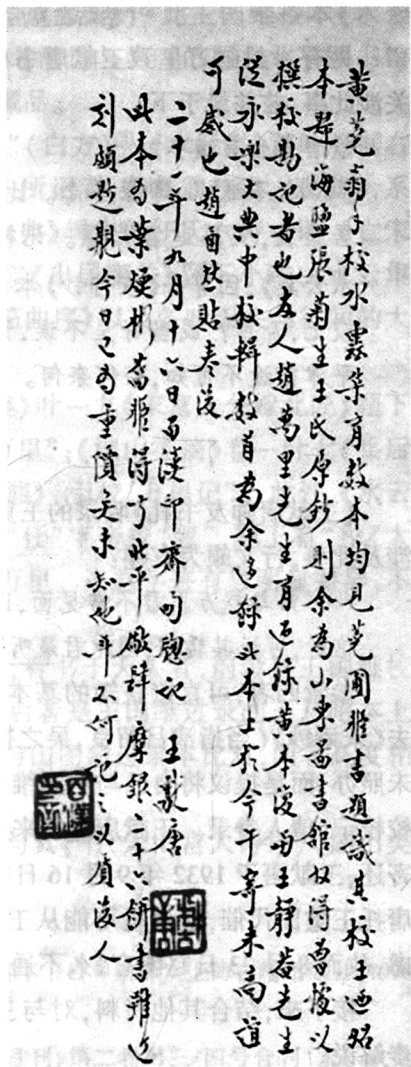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王献唐跋

《大典》本，有出弟手者，有出王静安先生手者，即诗字韵湖字数（今按“数”被划去）韵诸作，亦均移录，以备参考。闻贵处所得古器物甚多，有目录否？念之念之。匆匆，敬请著安。

弟里顿首

九月十二日

（粘贴在卷后扉叶）

另有一封赵万里致王献唐书札，亦关涉此事，兹并录于下：

献唐先生有道：

久不通讯，即深系念。比维起居康胜，文思迪吉为颂。託校《汪

水云集》，因尊寄《宋诗钞》本与鲍本略异，故未能照校。现里倩人录一校记，可否？成当寄呈不误，请释念为幸。近日有佳本否？时局如此，平津前途不可知，奈何奈何。专此，敬请道安。不一。

弟赵万里再拜

八月廿三日①

《王献唐师友书札》收录的王重民书信第十通（末署“七月四日”），侧面涉及此事，行文颇为有趣：

弟与赵万里君不常见面，因他忙，弟催怕亦无效，若与傅孟真先生来信时，可託其转催，因赵君最听从傅先生的话故也。弟见赵君亦可催促。②

参看四者，可直接获知的基本事实如下：王献唐托赵万里代校汪集，寄去《宋诗钞》（当指清吕留良、吴之振编《宋诗钞初集·水云诗抄》）。赵万里未照办，而是提议将自己与王国维据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及《永乐大典》所校校记，倩人誊录。王献唐遂寄来这部鲍刻本。过录完成后，赵氏将鲍刻本寄还，王献唐于1932年9月16日收到。在此过程中，赵万里有所拖延，王献唐托王重民代催，赵万里可能从王重民处或别的渠道感受到了王献唐的焦虑，故而8月23日赵函有“久不通讯”“成当寄呈不误，请释念为幸”等语。

接下来，结合其他材料，对与王献唐校理汪集相关的书、人与事作进一步解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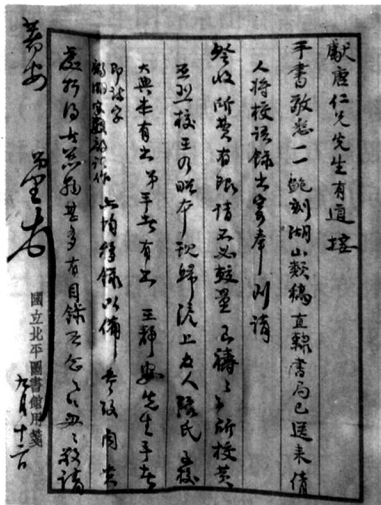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赵万里致王献唐函

①安可苻、王书林整理，杜泽逊编校：《王献唐师友书札》，青岛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756页。

②《王献唐师友书札》，第1722页。划线部分为王重民加圈。

一、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

赵函所称王国维和他分别用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及《永乐大典》校过的汪集校本,即王跋所云“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”,亦是在鲍廷博刻本上临校,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 A02938)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清乾隆三十年鲍氏知不足斋刻本 王国维校并跋 赵万里校”^①。1929年春,北平北海图书馆收购了王国维的190多种批校本,“(王国维)此项手批手校之书,共有一百九十余种,约七百餘册,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,特全部购入,以垂永远,并拟校录其批校语刊印成书云。”^②此王国维校本《水云集》《湖山类稿》应是其中之一。后来随着北海馆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,此本最终成为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。

该本《湖山类稿叙》首叶有“王国维印”(白方)^③,《水云集》首叶版框右侧外有“壬戌春,常熟王乃昭钞本校。眉头所记者,黄复翁校也。观翁”,系王国维手笔。此外,卷四末所录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汪氏六诗一词、《亡宋旧宫人词》卷末题跋四则、《湖山类稿》卷二《出居庸关》题下小跋、《水云集附录》叶二天头录《文山全集》卷二一《胡笳曲序》以及各叶天头与行间的大部分校字,亦是他的手迹。

至于赵万里所校,最明显的是《水云集》叶一九《宋宫人分嫁北匠》题下有“《大典》人字部引,‘宋’上有‘亡’字,万里”;《湖山类稿》卷一叶七《兵后登大内芙蓉阁宫人梳洗处》诗末有“据《诗渊》^④引校,万里记”。此外,《水云集》叶二六《邳州》“身如传舍任西东”句,“任”字旁校“忽”,题下有“校《大典》邳字韵引”,虽未署名,但笔迹亦出赵万里。王赵字迹有较明显差异,不难分辨,不再逐一列举。

王国维所校出的异文,有写在行间者,有书于天头者,前者是王国维校出的王乃昭本相对于鲍廷博刻本的异文,后者是王国维过录的王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,分处书写以区分之。与山图藏过录本比对,两者高度相似,可见过录时严格遵循了王国维原校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王国维的批校跋语还与其《书〈宋旧宫人诗词〉〈湖山类

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上册第403页。

②《馆讯(十八年三月四月)》,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二卷第三/四号合刊“永乐大典专号”,1929年4月,第361页。

③吴城《知不足斋合刻汪水云诗序》首叶另钤有“叶德辉煥彬甫藏阅书”白文方印。

④《诗渊》,明抄本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案,此书为孤本,仅见《文渊阁书目》著录。

稿)〈水云集〉后》(以下简称“《书后》”)一文^①有明显关联。比对可知,后者系以前者为基础,经较大增修成文,行文次序与繁简有变化。如《亡宋旧宫人词》卷末题跋首则,先引“宋陈世崇《随隐漫录》卷二”,次引“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中”,第二则引“《宋史·江万里传》”。《书后》一文的第一段,可大致与之对应,但行文次序变为先《浩然斋雅谈》,次《江万里传》,次《随隐漫录》。第三则“汪水云以宋室小臣……有宋近臣一人而已”,与《书后》末段大致相同。第四则“壬子岁,曾从《永乐大典》补诗六首、词一首,当时所见《大典》仅十六册,今已星散矣。想欲再得数首,亦不易也”,《书后》完全不见痕迹。另一方面,《书后》第二段“《宋旧宫人诗词》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云南归”,第三段“南宋帝后北狩事”“少帝入吐蕃事”,在批校题跋中则未着一笔。

王国维各条批校题跋末所署时间,如首跋“宣统庚戌正月国维识”、三跋“戊午八月国维录旧作跋”、《水云集附录》叶二天头录文末署“辛酉中秋录观翁”等,在《书后》中不见踪影。从行文连贯的角度考虑,如此处理,无可厚非。但欲复原王氏批校汪集并以之考察宋室北狩史事的历时性轨迹,这些线索便不可或缺。根据这些时间线索,王国维校理汪集的时间轨迹大致如下:他获得鲍刻本,不晚于宣统庚戌(1910)岁初。壬子(1912),以《永乐大典》补辑并校订。戊午(1918),“录旧作跋”。辛酉(1921),从《文山全集》卷二一录《胡笳曲序》。以黄丕烈旧藏王乃昭本校鲍刻本,为时最晚,在壬戌(1922)春。

至于王国维辑佚所用《大典》卷八九八诗字,卷二二七三、二二七四湖字,后两卷所在册为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,长期下落不明,直至2007年,得知在加拿大籍华人袁筱文处,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卷八九八目前仍不知所踪,与其相邻的两册为卷八九五至八九六、卷八九九至九〇〇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接下来,讨论赵万里以《大典》校此鲍刻本的时间。他本人对此未作说明,只能从周边情况展开推测。1929年,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二卷第三/四号合刊“永乐大典专号”登载王国维《湖山类稿补遗附校记》。此即前述王氏从《大典》辑出的六诗一词及据《大典》所作的5条校记,由赵万里录出整理,赵氏还将自己从《大典》邳字、人字校得的两条附入校记,标明“万里案”以与王国维校相区别,明确称邳字为卷二八〇七,人字为卷三〇〇四。

^①王国维著,彭林整理:《观堂集林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522-525页。

文末赵氏识语署“己巳上巳后二日”^①,即1929年4月14日,这是赵万里以《大典》校勘的时间下限。

再看时间上限。首先,赵氏最有可能接触并利用《大典》,理应在1928年6月他入职北平北海图书馆后^②。案,他当时的上司袁同礼相当关注《大典》的存世情况,多次撰文条列《大典》现存卷册的收藏情况,考虑到袁氏的职务,他对《大典》的收藏变动情况(尤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情况)的掌握,应是相当及时而准确的。1923年11月,袁同礼撰写《永乐大典考》(发表于《学衡》第26期),附表列出当时所知存世的《大典》卷册,称卷三〇〇三至三〇〇四在“京师图书馆”(应是清末学部图书馆创办时即在馆者),但未载卷二八〇七。之后,他的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》(发表于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1卷第4期,1925年末出刊)、《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》(发表于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2卷第4期,1927年初出刊)、《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》(发表于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》第3卷第1期,1927年6月袁氏出访日本,此文写于他归国后),均无卷二八〇七。直至1929年2月,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》始标明卷二八〇七在国立北平图书馆^③。从袁氏诸文的发表情况来看,卷二八〇七出现并入藏北平图书馆,应在1927年6月后至1929年初。然则,赵万里以《大典》校勘汪集,当在1928年6月至1929年4月间。由此细节亦可见,赵万里在王氏亡故后努力完善乃师著述,这是极可感佩的。

二、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

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的主要对校依据即所谓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,该本是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八著录的四部汪集抄本中的第二种,《题识》著录为“校旧抄本”。《题识》此本条下收录黄跋三则,分别写于乾隆六十年乙卯(1795)、乙亥(嘉庆二十年,1815)、道光二年(1822);此外还录有“壬寅端阳前三日,乐饥翁携赠”以及嘉庆元黠阉茂(七年壬戌,1802)皋月十又四日邵恩多跋。

不过,黄丕烈首次提及王乃昭本,却是在“从骑龙巷顾氏得来”的另一部“钞本《汪水云诗》不分卷”的题跋中,说他在乙卯(乾隆六十年)四月购得“《汪大有诗史》一册”:

①王国维:《湖山类稿补遗附校记》,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二卷第三/四号合刊“永乐大典专号”,1929年4月,第339-341页。

②1928年6月初,赵万里正式入职北平北海图书馆,任编目科科长(刘波:《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18年,第45页)。

③袁同礼: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》,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》第二卷第三/四号合刊“永乐大典专号”,1929年4月,第221页。

此钞本《汪水云诗》，余向从骑龙巷顾氏得来，卷首及尾图记皆武陵所钤也。今乙卯四月，书人吕邦惟携书三种求售，内有《汪大有诗史》一册，行款与此本相同，而字迹较旧，讹舛亦少，第三十九叶多《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还》诗一首，卷尾多补录四叶，第四十八叶末有“牧翁蒙叟”“钱谦益印”两方印，煞尾有“此君别馆”小方印，不知谁氏所记。其补录之字迹与通体异，余友陶蕴辉云此牧翁笔，以其为少年时书，故与老年微异。余虽不甚信，然征诸前之图记，理或然也。棘人黄丕烈。^①

同年六月，黄氏在新获得的这部“《汪大有诗史》”卷首题写了第一则题跋：

此旧钞《汪水云集》，予从郡城贮书楼蒋氏得来。卷端有金耿庵题识并大小图章四方，又有“乃昭印信”“乐饥”两图章，不知彼何人斯。卷尾有行楷四叶，未识谁氏笔。余友陶蕴辉识是东涧老人书。盖予所见者皆暮年笔，兹或少壮时书，故娟秀如是。且以前两大方印证之，理或然也。予向得钞本于骑龙巷顾氏，虽行款悉同，究不及此本之旧，又少补录之文。故急以千钱购得，为文房清玩之助，命工补葺而重装之。乾隆六十年乙卯六月中澣一日，棘人黄丕烈书于士礼居。^②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跋不再称之为“汪大有诗史”，改称为“汪水云集”。案，所谓“汪大有诗史”并非卷端题名，而是此本旧书衣上的旧藏者题写的书名（下钤“凤巢”朱长印），由于黄丕烈“命工补葺而重装之”，添加了新书衣，题有“汪大有诗史”的旧书衣被保留在内。而此本实际的卷端题名为“汪水云诗”，黄跋亦未严格照写。结合此跋与前揭骑龙巷顾氏旧藏本跋，黄丕烈对此本的初步认识可归纳如下：1. 卷前护叶“壬寅端阳前三日，乐饥翁携赠”是金俊明（耿庵）所题。2. 卷端“大小图章四方”是金俊明藏印，而“乃昭印信”“乐饥”“此君别馆”三印的主人不详。3. 卷末以行楷补录的四叶与他叶字迹不同，黄氏不识出自何人，陶蕴辉主张是钱谦益，加之“牧翁蒙叟”“钱谦益印”的佐证，黄氏暂且采信。4. 基于上一点还可知，黄氏默认钱氏二印为真。

20年后的嘉庆二十年春，黄丕烈购得经叶万题跋的另一部汪集抄本（即下文所述“叶石君本”），比勘之后，在王乃昭本卷尾又题一跋：

乙亥花朝，收得《汪水云诗钞》有叶石君跋者。因出是册对勘之，知此《汪水云诗》叙脱其后者，刘辰翁会孟所书也。“五日庐陵文山”云云者，乃脱其《书汪水云诗后》之文前段也。余尚有别本在，不复补之矣，

①该抄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 09640），著录为“《汪水云诗》一卷附录一卷，清抄本，清黄丕烈校并跋”。本文所引黄跋，皆据原书的电子书影照录，与《芜圃藏书题识》录文或微有不同。

②该本现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（以下简称“台图”），索书号 10738。

恐笔迹异也。惟是此书钤有迺昭印,向不知为何人,并以最后补录四叶为牧翁书,由今考之,皆非也。近日见虞山王乃昭手录《石田诗稿》,始知迺昭即乃昭,与牧翁同时而稍后,善于书法。以补录之手迹证诸《石田稿》,相类,此书盖藏于迺昭而为之补录者。事隔二十年,始得定其何人并何人之手迹,亦难矣哉!越二十日,检书偶记。复翁。

这时黄丕烈的认识发生变化。通过比对“王乃昭手录《石田诗稿》”,他判定王乃昭是此本旧藏者,卷末补录四叶亦出自王氏,而非钱谦益。此外,他虽未明言,但显然已认识到卷末钱氏二印至少是真印伪钤。

7年后,黄丕烈又获得一部有王孝咏藏印的抄本,以之与王乃昭本对校后,他在王乃昭本上留下了两处文字。一是在卷末第二跋后接写的一则题跋,二是在前述乾隆六十年重装时添加的新书衣上的题字:

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十一日,余过胥门学士街书坊,见插架有钞本《汪水云诗》,卷端有王孝咏慧音图书,因携归。出所藏手校一过,补此册刘辰翁序半篇,其余亦稍有歧异。余向校影元钞本《湖山类稿》,其刘序已有,此钞本偶失其半耳。立春后一日,菟夫识。

六十老人菟夫记。

汪水云诗 道光壬午春初,手校王慧音藏旧抄本。(书衣)^①

此外,嘉庆七年,黄丕烈让邵恩多校过王乃昭本,邵氏校后作跋,称“以余所收槐柳巷蒋氏明钞本校之,互有差异,因即标签识之”。覆按原书,则知王乃昭本的贴签校语为邵校,书叶上的校字则是黄丕烈据王孝咏本对校所写。再与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对勘,可知王国维仅过录黄校,不采邵校。

王乃昭本从士礼居散出后,终为传书堂蒋氏所得。王国维代蒋氏作《传书堂藏书志》,在卷四以“《汪水云诗》一卷《附录》一卷 校钞本”著录(王国维得以用它校己藏鲍刻本,当与其与蒋氏的交谊有关)。王国维还修正黄说,提出补录的四叶非出王乃昭之手:

此虞山王乃昭家钞本,后以赠金孝章。黄复翁得之,初属邵朗仙以明钞本校之,后见王慧音藏旧钞本,复手校于书眉。卷末补录四叶,复翁定为王乃昭书,然引及《日下旧闻》,恐非乐饥翁所及见,或孝章家子弟所补也。其“牧翁蒙叟”、“钱谦益印”、“此君别馆”三印,均后人所加。有“凤巢”、“乃昭印信”、“乐饥”、“俊明之印”、“耿庵”、“春草闲房手定”诸印。^②由于未见王乃昭本原书,引发了王献唐关涉该本的三个误解。

①台图整理之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收录以上三跋(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下册,1992年,第554-555页),但未录书衣题字。《菟圃藏书题识》同。

②王国维撰,王亮整理:《传书堂藏书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020-1021页。

首先,如赵万里函所透露,至晚在 1932 年,王乃昭本已改归“沪上友人张氏”所有。王献唐误认为是张元济,后来误解进一步发酵,其《汪水云集版本考》径称此本“闻今藏涵芬楼”^①。案,“沪上友人张氏”乃指张钧衡之子张乃熊,张氏籍属南浔,但实际长期在上海活动。其《苕圃善本书目》卷六下著录“《汪水云诗》一卷《附录》一卷 旧钞本 一册 苕圃三跋 邵恩多校跋”^②,便是王乃昭本。抗战时期,苕圃藏书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,此本亦在其中。检该书电子书影,卷末黄丕烈第二跋前一叶铃有“苕圃收藏”印,是曾藏张乃熊处的明证。此外,赵万里与张元济年辈相差悬殊,称之为“友人”,颇为不伦,不知王献唐何以失察此节。

其次,王献唐还误解了赵万里所称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的所指。赵氏原意是指黄氏据别本校王乃昭本,在王本上留下了校记。王献唐却将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理解为黄氏以王本为参校本临校别本,在别本上留下校记。于是,他在前揭题跋中说“王氏原抄,则余为山东图书馆收得,曾据以撰校勘记者也”^③。不过,“黄丕烈校王乃昭本”与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之间的层次关系,确实缠绕复杂,为进一步明晰,试作表 1、表 2 以示之:

表 1

王乃昭本	递藏	王乃昭—金耿庵—贮书楼蒋氏—黄丕烈—蒋汝藻—张乃熊				
	校勘		校者	时间	参校本	校勘类型
		A	邵恩多	嘉庆七年	槐柳巷蒋氏明钞本	对校
		B	黄丕烈	道光二年	王孝咏旧藏钞本	对校
王 国 维、 赵万里合校本	递藏	王国维—北平北海图书馆/国立北平图书馆/中国国家图书馆				
	校勘		校者	时间	校勘来源	校勘类型
		甲	王国维	1912	《永乐大典》卷八九八、二二七三、二二七四	他校
		乙		1922	王乃昭本	对校
		丙			王乃昭本黄丕烈校语	过录
		丁	赵万里	1928-1929	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八〇七、三〇〇四	他校
		戊			《诗渊》	他校
赵 万 里 过录本	递藏	王献唐—山东省立图书馆/山东省图书馆				

①王献唐: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,齐鲁书社,1984 年,第 209 页。
②张乃熊:《苕圃善本书目》,广文书局,1969 年,第 186 页。
③王献唐后来也意识到原先判断有误,不再称自己所获得的是王乃昭本,改称“一粟斋本”,与王乃昭本并列(王献唐: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,第 216-217 页)。

表2 诸本诸次校勘之实质

王乃昭本校勘 A	王乃昭本/槐柳巷蒋氏明钞本间的差异
王乃昭本校勘 B	王乃昭本/王孝咏旧藏钞本间的差异
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本校勘甲	鲍刻本/《永乐大典》卷八九八、二二七三、二二七四间的差异
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本校勘乙	鲍刻本/王乃昭本间的差异
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本校勘丙	王乃昭本/王孝咏旧藏钞本间的差异
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本校勘丁	鲍刻本/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八〇七、三〇〇四间的差异
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本校勘戊	鲍刻本/《诗渊》间的差异

第三,王献唐《汪水云集版本考》排比版本系统,比较诸本卷端题名之差异,进而探究汪集原本之初名,认为王乃昭本的书名作“汪大有诗史”,在诸本中为仅有,故将其单列为“庚系”,还就此做了一番解说:“马翔仲跋《水云集》云,因题其集曰诗史。王题殆从此出,亦非原本如是……庚则随意因马跋署之,不足据也。”^①如前述,“汪大有诗史”是王乃昭本旧书衣上的题名,王献唐此误是惑于黄丕烈“《汪大有诗史》一册”之语所致。

三、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的底本

王献唐校本系用“海曲王氏双行精舍”格纸先传抄底本,再在其上施加校记。其特征为:诗一卷附录一卷,半叶十行二十字,首刘辰翁汪水云诗叙,次钱谦益(署牧翁)汪水云诗叙,次正文,次附录。正文卷端书名作“汪水云诗”,次行题“水云汪元量字大有”。王献唐还描摹了底本的旧藏印,计有“壹是堂读书记”“徵云之印”“宋存书室”(以上在刘辰翁叙首叶),“一粟斋”“王孝咏”“慧音”“杨绍和审定”“彦合珍玩”“杨氏海原阁藏”(以上在正文首叶)。卷末有王献唐跋三则:

据海原阁藏叶石君抄本再校一过。叶本每半叶十行,行十九字,于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藏事,献唐记。

右《汪水云诗》,依海原阁藏旧钞本,属玉章兄录出。向晚上灯,手自校雠,由六时起,至十一时卒業。点画一衣原本,即错误处亦仍之,前后印记并规摹备考,惜未一律耳。其海源阁一印,旧为山东图书馆购藏,适在案头,以原书旧有此记,即取而钤之。时二十年七月十六日,中夜漫记,王献唐。

原书每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。

^①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,第217页。

二十年十一月八九两夜,复取鲍氏知不足斋刻本《湖山类稿》通校一过,以“献校”二字别之。《类稿》共诗一百六十一篇,此八十三篇,见于《类稿》者三十篇。献唐再记。^①

从摹写的藏印及题跋来看,王献唐所据底本显然经过海源阁收藏。检《楹书隅录续编》卷四,共著录3部汪集,其中之一是“旧钞本汪水云诗一册不分卷,末有附录数叶”,“此本与前本诗同而行款各殊,钞校皆精,多附录数叶,亦复翁手校钱氏藏本也。有‘一粟洲’、‘王孝咏印’、‘慧音’、‘徵云之印’、‘壹是堂读书记’、‘复翁’、‘百宋一廛’各印”^②,恰与王献唐校本相符,可知它即是王献唐所据底本,另两部则可排除。

而此本的铃印情况,又恰与前揭王乃昭本黄丕烈第二跋所云“见插架有钞本《汪水云诗》,卷端有王孝咏慧音图书,因携归”相合,可知它便是黄氏在道光二年购得的王孝咏(字慧音)旧藏抄本^③。

此外值得一提的是,王绍曾调查海源阁藏书去向,声称在王献唐之后,此本踪迹不明:

散出后先归王献唐,王氏曾据以校勘,撰为《汪水云集校勘记》、《汪水云集版本考》,又编为《汪水云事辑》。一九八四年齐鲁书社即以王氏手校本影印问世。原本去向不明。^④

今案,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05735号山东省博物馆藏“汪水云诗一卷附录一卷 清初钱谦益家抄本”(即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4785号),半叶九行二十字,图录中的书影是刘辰翁叙首叶,正铃有“壹是堂读书记”“徵云之印”“宋存书室”诸印^⑤。可见它便是王献唐所据底本,亦即王孝咏旧藏抄本。

此本转归山东省博物馆,系因抗战时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内迁善本后被转拨给山东省博物馆。屈万里《山东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运移曲阜金石图籍

①《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》,第89-90页。

②王绍曾、崔国光等整理: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齐鲁书社,2002年,第479页。另,“一粟洲”之“洲”,乃辨认“斋”字篆形时有误。

③王献唐描摹的藏印中,无黄氏“复翁”“百宋一廛”印,与《楹书隅录续编》所述不合,未知何故。

④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第479页。

⑤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: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第8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0年,第88页。

书画目录》，集部有“《汪水云诗》不分卷二册（宋汪元量撰 清初抄本）”^①，可知此本正属内迁善本之一。

递藏	王孝咏	黄丕烈	海源阁	王献唐（山东省立图书馆）	山东省博物馆
诸家称谓	不详	王慧音藏旧抄本	旧抄本	海原阁藏旧钞本/王氏（王乃昭）原抄/一粟斋本	清初钱谦益家抄本

四、结语

本文首次披露的王献唐题跋与赵万里书札，进一步丰富了对王氏校理汪集始末细节的认知。赵万里据以过录的王国维、赵万里合校本，系据王乃昭本对校，并过录了黄丕烈据王孝咏本的校字，其中包含多个版本的文本面貌。而王乃昭本、王孝咏本，经多家递藏，诸人对其有不同称谓，遂引发王献唐的一系列误解。此外，王、赵合校本有利用《永乐大典》之处，这为今人探究民国时期《大典》所存卷册的流转情况，提供了一些侧面线索。正因其间所涉书、人、事纷繁复杂，这两份此前未见披露的一手史料，就具有了多个层面的文献价值。

附记：董婧宸、董岑仕女士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，林锐先生提供了帮助，特此鸣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石祥，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。研究方向：版本目录学。

^①屈万里著，屈焕新编注：《载书漂流记》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，第111页。案，此次善本内迁，先至曲阜，后经汉口等地入川。